

澳门问题 邓小平对解决时机的把握

澳门即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与解决香港问题一样，解决澳门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不过，澳门回归祖国面对的问题挑战与香港有所不同，针对其特点，邓小平特别注意把握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

“拖一下”的玄机

澳门历来是中国领土，但自1553年起，被葡萄牙非法占据达446年。不过，相较于鸦片战争后才被英国占据的香港，收回澳门的主权和管治权却不那么复杂。因为香港问题是英国政府先后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和租借香港的土地造成的。澳门方面，虽然在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政府也曾向清政府提出一些不平等条约，使其管治权合法化，但其承认澳门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葡方只是“永驻管理”，这为中方提供了有利于收回澳门的前提。

1974年葡萄牙发生革命，之后宣布实施非殖民地政策，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而不是葡萄牙殖民地。1979年2月8日，中国和葡萄牙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就澳门问题双方达成原则谅解，同意“澳门是中国领土，定将归还中国。至于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可在将来认为适当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当时，邓小平并没有急于解决澳门问题，而是精细地把握着澳门回归进程的节奏，这是出于对实现祖国统一的全盘考虑。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单独提出澳门问题，而是在论述台湾、香港问题时同时谈到。不单就论述并非不关心，而是有整体的计划。

1987年，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前，邓小平向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阐释：“就澳门问题来说，解决的条件早已成熟，你们早就想把澳门还给我们。我们拖了一下，主要是当时对用什么方式解决澳门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解决了澳门问题，香港、台湾问题怎么办？”他还指出：“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

可见，“拖一下”的玄机在于，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过程中，中央采用的是先难后易，首先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战略。实践证明，经过复杂斗争实现了香港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就为澳门回归提供了成功、生动的范例，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方案，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邓小平于10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规模达200人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其中包括澳门立法会议员、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棣，他在活动快结束时请邓小平谈一下澳门的问题，邓小平向众人说明：“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我们以前不讲，是不是因为澳门问题影响了其他。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这是邓小平就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和方式首次公开表态。

“拖一下”的另一个目的是保持澳门的稳定繁荣。邓小平的上述表态迅速引起澳门居民的热切反响。尽管对“一国两制”普遍接受，但当年很多澳门人还没有在心理上真正准备好迎接回归，尤其是澳门的地域和人口规模都较小，澳门人长期被排除在政府管理之外，比较缺乏治澳的人才，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安情绪。于是，邓小平时隔两天再次发声。

10月6日，邓小平会见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夫妇时说：“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下去。”通过连续的两次谈话，邓小平重申了我们一贯的立场，阐述了澳门问题解

决的方式和时间，发挥了稳定澳门人心的作用。

次年2月22日在广州珠海宾馆，邓小平向马万祺等人询问澳门的社会经济情况。马万祺回答说：澳门目前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1984年出口总值增长幅度较大。邓小平连连称好，他向澳门同胞致以节日问候，并对华裔工商界人士促进澳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给予鼓励。

1985年5月24日，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访华，邓小平对他表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这时，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实际也有三种考虑：一是早于香港，二是同时收回，三是晚于香港，错开一点。邓小平倾向于第三种考虑，但是主张必须在20世纪内解决。这是在中葡谈判开始前就已经确定的了。

不容许“拖”的宣言

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的谈判自1986年6月30日开始，用时8个半月，共4轮。双方存在两个比较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门回归的时间。

中方在谈判启动时即提出：比香港回归晚一年，1998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这样表示澳门与香港不同，也有利于平稳过渡。但葡方却要求在葡占领澳门450周年，即2003年归还澳门。

为什么葡方非要推迟交接时间呢？首先，葡萄牙仍想把澳门当作在东南亚拓展贸易和文化的桥头堡，不愿放弃在澳门的诸多利益。其次，则与葡萄牙国内的党争有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欧各国的绝大多数政党都对党纲进行了重大修改，以争取最大多数选票为目的。而葡萄牙各政党左右翼之间的分野却依然比较鲜明，四大传统政党地位稳固，代表左翼的社会党和代表右翼的社会民主党两强相争的局面一直持续。1985年，社会民主党刚刚上台执政，变成在野党的社会党希望扳回一城，与中国进行的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也成为两党大做宣传文章、争夺选票的竞技场。社会党的领导人甚至公开表示，要到葡占领澳门460周年，即2013年才把澳门归还中国。

澳门回归时间的问题经旷日持久的谈判，无法达成协议。1986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访问葡萄牙深入磋商，但双方仍未能取得共识。

邓小平看清了这一情况的本质，他特别坚决地要求：“澳门必须在本世纪内收回，不能容许葡萄牙把它在澳门这条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周南在回国登机前向记者表示：“在20世纪末之前，完成港澳回归祖国的大业是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于12月31日再次表态：“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时间调整为1999年12月20日。

面对中方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葡方不得不作出反应，软化了原有立场，强调加强葡萄牙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有“极大重要性”，并向我方作出友好表示。1987年，葡连续2次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由总统亲自主持，讨论长达数小时，最终接受了中国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方案。

对节奏的把握促进了祖国统一和地区繁荣稳定

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对时机的精确把握都非常重要。所谓“相时而动”及“锋而试”，邓小平对解决澳门问题节奏的把握，张弛之间蕴含高超的外交智慧和领导艺术，既营造最有利的前进态势，又抑制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促使这一历史上长期遗留的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后，日本《每日新闻》称赞：“具有长期殖民地历史的澳门归还给中国，在亚洲解放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应该赢得历史性的评价。”

“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想，为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提供了最佳方案。全程参与这项工作的周南则谈道：“邓小平不但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光辉思想，而且亲自领导了按照‘一国两制’思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全过程。”“他都是在关键的时刻，对于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作出了关键性的指示。”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使中国社会安定团结、欣欣向荣，也使祖国统一大业不断迈向前进。20年来，澳门出色地实践了“一国两制”，保持稳定繁荣，发展多元文化，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如今更成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闪亮的“盛世莲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澳门回到祖国怀抱，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开辟了澳门发展新纪元。”



让跨越时空的苏区精神永放光芒——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孙 伟

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湖北省洪湖市城区西南郊的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内。纪念碑正面镶嵌着“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十二个金色大字，碑座正方上镌刻着纪念湘鄂西人民伟大功绩和悼念英勇牺牲烈士的碑文，内容如下：

湘鄂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湘鄂西特委领导下，于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在全国秋收暴动和南昌暴动影响之下，反对豪绅地主和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开展了武装斗争，建立了红色游击队。一九二九年，在江、石、监、沔地区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在鹤、桑、慈、松、监地区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鄂北襄、枣、宜、房、谷、均、郧地区，鄂西兴、归、巴地区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一九三〇年四、六军会合于公安，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同志统一领导指挥，形成了一支强大力量，配合全国红军攻势，威逼武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武装斗争的开展，开辟了湘鄂西广大的革命根据地，打倒了豪绅地主，分配了土地，建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之下，开始向苏区和红军进行了残酷的进攻，红军主力击退了五次围攻于一九三五年北上抗日，离开了湘鄂西根据地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人民，在遭受了严重摧残之后转入地下，仍然坚持着英勇不屈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湘鄂西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鄂西边区党委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战争，建立了襄南和襄西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党中央于一九四四年从延安又派来了八路军，加强了当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新四军第五师主力被迫北上，根据地人民再次遭受了反动派的摧残。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南下后，湘鄂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江汉区党委领导下，部份的恢复了革命根据地，直至解放战争胜利。

在几次伟大的革命战争中，湘鄂西的人民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英勇地牺牲了。其中如周逸群、鲁易、柳克明、万涛、彭之玉、崔琪、刘绍南、彭国才、段德昌、段玉林、周小康、贺锦斋、王炳南、黄大鹏、吴先洲、

□ 吴蔚然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全党干部的一次新的思想洗礼，也是夯实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契机。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是党的工作末梢，是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最要堡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做好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就是要适应新形势，应对新问题，着力在“继承、发扬、创新”上下功夫，利用此次主题教育，坚守初心，担起使命，发现差距，抓好落实，切实提升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全面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在继承光荣传统中掌握方法。继承就是把把我们党长期以来践行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传承下来。从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期，到热火朝天、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广大基层党组织总是走在党的各项工作最前沿，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铸就了对党忠诚、无私忘我、默默奉献、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精神，也在不断探索中积累了许多贴近地气的工作方法。我们必须不断总结学习先进党组织的优秀传统和工作方法，切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发扬工作经验中提升质量。基层党组织建设长期以来积累了许多好的工作经验，需要立足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发扬就是要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政治建设引领带动基层党建质量全面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真正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所谓“欲筑室者，先治其

（二）

1978年10月，在洪湖城区西南郊长江之滨动工兴建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1984年11月10日正式落成。陵园主体建筑有贺龙元帅铜像、四柱牌坊、烈士纪念碑、革命历史馆、革命烈士馆、将军墓等，占地面积606亩，四周长度6300米。位于陵园中心的纪念碑，在园内其他建筑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巍峨壮观、高大挺拔。

纪念碑重达4200余吨，碑高27.6米，代表着湘鄂西苏区革命斗争是1927年6月开始的。碑身为花岗岩砌成，正面向北，碑名主要是仿鲁迅先生字体临摹而成；背面向南刻着贺龙元帅生前题词“革命烈士们的业绩鼓舞着我们永远前进”。碑身东西两侧刻有五星、稻穗、红旗、党徽组成的装饰图案，图案为金色，代表着希望；金色稻穗环绕在党徽四周，左右两边还有红旗，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

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文，概述了湘鄂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碑文共计800余字，主要有三层含义。

首先，回顾了湘鄂西苏区的创建、发展到最后丧失的历史。湘鄂西苏区创建于1927年底，后不断发展壮大，在鼎盛时期人口约370万，拥有主力红军3万人、地方武装20万人及50余县的红色政权，自1931年起先后打破了国民党五次围攻。1935年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撤离根据地，长征最终到达陕北。

其次，勾勒了主要割据区域和主力红军概况。湘鄂西苏区以洪湖地区为中心，由湘鄂边、洪湖、巴兴归、鄂北、鄂西北、荆当远、松枝宜和洞庭湖特区等八块根据地所组成，主力红军是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由红四、红六军组成的红二军团。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在继承中发扬 在发扬中创新

基”，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必须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政治建设，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持续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始终秉承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优良传统，大力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在创新方式方法中开拓进取。创新是前进的基础和活力源泉，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基层党建工作与时俱进，以改革的精神、改革的举措推动基层党建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要在全面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基层群众工作光荣传统、不断打造基层工作坚强堡垒的基础上，在工作思路



最后，列出了25位主要烈士的名单。湘鄂西苏区走出了元帅贺龙、大将许光达、上将贺炳炎等67位开国将帅，也牺牲了近20万革命先烈。在此特别写出周逸群等25位革命烈士的名字，极为罕见，告诫后人要缅怀革命英烈，发人深省。

在贺龙、周逸群等的领导下，不仅在创建苏区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而且带领广大军民践行了伟大的苏区精神，如表现出威武不屈、临死不惧的革命气概；根据实际情况，较早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有力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制定了“做十个好党员”的“十条标准”，注意发挥廉政歌谣对反腐倡廉的引导作用；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贺龙谢绝做新衣，周逸群不动一块银圆；在中国革命史上开创了水上游击战争的光辉范例，并成为全国唯一一块建立在河湖港汉地带上的水上革命根据地等。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